

内部交流

研究与参考

2014年第十四期（总第44期）

“2014年的美国与中美关系”研讨会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2014 年的美国与中美关系”研讨会

编者按:近日,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召开了“2014 年的美国与中美关系”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东方早报、新民晚报的媒体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杨洁勉、吴心伯、宋国友和刘鸣分别就 2014 年的中美关系、美国的政治和战略走向、美国经济与中美经贸关系以及美国的亚太政策发表了观点,其他与会专家学者也积极参与了讨论和互动。我所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和互动讨论集结成册,供领导和专家学者参考。发言稿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仅供参考。

会议主题: 2014 年的美国与中美关系

会议时间: 2014 年 12 月 27 日

会议地点: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208 室

主办单位: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与会者名单

(按姓氏拼音排序)

1. 焦世新,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安全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2. 刘鸣,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
3. 罗小军,晨哨集团副总裁;
4. 潘亚玲,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5. 潘忠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6. 邵育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中心执行主任、台港澳研究所研究人员、副研究员;
7.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8. 孙海泳,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9. 汪晓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10. 王联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
11. 韦宗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12. 卫蔚,新民晚报记者;
13. 吴苑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执行所长、美洲研究中心成员、副研究员;
14. 吴其胜,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5. 吴挺,东方早报记者;
16. 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7.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吴心伯: 每年的年末,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都要开年会,年会的主题都是扣紧这一年的中美关系进行探讨。第一,把这一年美国政治经济和战略走向做一个梳理,第二,对美国的发展和变化有更深的把握。另外就是对这一年的中美关系发展做一个深度分析,从而对于世界上最重要这对双边关系有更正确的认识。

今天的会议,我们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是主题发言,下半场是讨论。主题发言安排四位,分别从中美关系,美国的政治与战略走向,美国经济与中美经贸关系,以及美国亚太政策这四个方面切入。

首先有请杨洁勉主任,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杨洁勉:在北京开会时我讲的是美国的内政、经济的变化及对全球战略的影响和互动,我讲了三句话:1. 美国的国内政治难题有增有减,其中增多减少。2. 美国的经济起起落落,其中起短落长。复苏是中短期的,相对衰落是长期的。3. 美国的全球战略有进有退,但是进退两难。美国现在要完全从阿富汗、中东退出难,在亚太地区要实行局部的进攻恐怕也难。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下面就从历史的纵深、哲学的探索,战略思维和政策规划这些方面对中美关系进行思考。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纵深是怎么样的?

从大国关系的历史来看,修昔底德陷阱早就有了,但 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没听说。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把中美关系比作“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大国政治悲剧,所以现在大家都套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讲述中美关系。

我在网上发现最早是倪世雄老师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有过总结。他指出,江泽民主席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提出了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所以在中国,最早提新型大国关系的好像是倪世雄老师。我还想查江泽民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什么时候提出这个说法的,但是查不到。新型大国关系和旧型大国关系,既要从世界来看,也要从中国来看,我认为在中国提新型大国关系确实是从江泽民开始的。

习近平 2012 年去美国访问时讲到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还不算是习近平的,因为当时主席还是胡锦涛。后来胡锦涛在六、七月份的两个场合提到了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一次是在战略经济对话上,一次是在墨西哥同奥巴马会见时。

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恐怕是 1.0 版本,主要是以守为攻,在当时的条件下,美强中弱,美攻中守。

从庄园会谈开始,恐怕是 2.0 版本。这个版本应该说是有攻有守。奥巴马在参加北京 APEC 会晤期间与习近平进行的中南海瀛台夜话比较轻松,非正式,这和庄园会谈的气氛类似。那么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 3.0 版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碰到外办主任李铭俊时,他说瀛台夜话中很重要一点,就是习近平向奥巴马谈了中国的价值观、制度和道路。为什么 1.0 版本是守势呢?这是当时的情况和形势使然。现在形势改变了,习近平要理直气壮地讲中国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现在还要加上价值观自信。据李铭俊讲,奥巴马说习近平是第一个对他讲这些话的人。

我想我们跟李侃如他们这样讲是不行的,学者是有学者的套路。但我认为回顾过去,放的长一点。修昔底德也好,格雷厄姆·艾利森也好,米尔斯海默也好,倪世雄老师也好,他们都对知识的积累做了一点贡献,所以历史会记他们住。所以我认为我们要 add to,从正面去增加对事物的理解和认知。批评谁都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要有个人的历史担当。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哲学思考是什么?

我们两国,在外交哲学交界的表面,我认为是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基本相似的宏观世界眼光和务实的哲学传统。说白一点,中美两国的哲学都很实用主义。

第二是从互动中接进的相互欣赏和互补方面。东方古国的传统哲学和美国年轻的现代哲学,相互之间具有特殊的魅力,而且也殊途同归。美国人常讲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习近平引用老子的话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就这么回事。

第三是在较长时间里面,中美两国世界观和宗教观难以趋同。美国有天赋使命的说法,毛泽东有替天行道的思想,现在是一回事,不清楚。我认为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理论建设和哲学建设,就是要让我们的领导人和美国的领导人的谈话是深邃长远的,在战略和宏观层面上进行思想交流。

当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时,说“我只跟你谈哲学,具体的事情周恩来跟你谈”。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美国人上台也是像模像样的,我们只谈哲学,但是谈了一次就谈不下去了,说我们要有 deliverables(可交付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现在需要准备应对新的美国总统上台,我们有两年的准备,我认为你们的课题要从这个方面去做。所以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进程中间,两国需要努力同享共同的外交哲学,共建相似的外交哲学,和共处相依的外交哲学。

其实共同的外交哲学是有先例可源的,近年来,中国和欧洲在外交哲学上的趋同性是增加的。现在中欧致力于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中国应当充分利用体制机制优势推进中美两国务实的工作,加强外交哲学的交流、交汇和交融。

第三是战略思考,就是要从战略上总结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现在,可以从长远目标、任务、途径、手段和效果等方面,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1.0 版本进行初期的战略评估、分析。

现在学界比较多的是在分析美国为什么不太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但是我们需要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出更加精细的战略部署和战略分析。现在中美对话机制已经接近一百个,今年的战略经济对话和人文对话,一共有 320 项成果,我认为水分很多,当然确实也需要先把中美交流的良好氛围烘托起来。但是我们要加强客观评估,加强统筹协调,强调贯彻落实。这次我在北京开会时,很多人就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和建议已经提出了很多,现在的重点是要

落实,这我是很同意的。

第四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政策思考。

政策是落实理论和战略的主要途径,在研究的实证性和应用性极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政策规划,往往会被对策研究所替代。我认为,学者更多地应该着眼于政策规划,因为具体的情况我们不是太熟,我们提出的很多东西要么是人家已经想过但办不到,要么是已经做过的。

政策规划有四点。第一,要制定不断产生效应的政策。在信息化时代需要平衡政策的早期收获和长远效果。新型大国关系一定要有实际成果,哪怕这些成果未必有益于将来的长远利益。我认为邓小平就是非常务实的,中美两国先建交,售台武器暂时搁置,从 1982 年一直搁到现在。也就是说,要两害相权取其轻。

第二,要制定能够超越美国政党政治,两党分歧的政策。比如说中美在中东、非洲、防扩散,气候变化、抗灾等领域的利益交界点比较多,在这些领域制定和两党共识比较接近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中国成为美国大选敏感期内,两党候选人敲打中国,把中国当靶子的可能性。至少在美国大选期间,让中美关系实现强基固本,再加上体制上的保障。也就是说,中美关系要能经受住大选的考验,在美国总统更替之时。完成平稳过渡。

第三,要制定能够长期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这是我的梦想。蒋介石当初就想做到这点,他支持杜威,反对杜鲁门,但他的手段很有限。我们不要老让美国来想怎么影响我们,我们现在有两年时间去想如何影响美国。国家穷国家富,国家先进或落后,不能限制思想的自由翱翔。所以,在通过中美与第三方合作中去影响美国的政策这方面,我们做的很少,我认为是有大有可为的地方。

最后,是要建立政策评估机制。比如说我们可以对战略对话、各个机制平台和各个具体的政策进行评估。为什么 11 月的习奥峰会把《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签订下来了,其实这个联合声明没有实质性的东西,里面很多举措都是已经在做的,只不过现在被写入官方文件中并公开发表了。至于政策评估,我认为学者可以进行分工,二十个人搞一项重大政策,中美重大政策也不会超过十个。中美关系是显学,搞的人很多,但是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定要把它研究深、研究透,还要进行整合。

吴心伯: 我认为杨主任的发言居高临下,这样一个思考的框架可以管中美关系很多年。接下来我的发言主要是讲美国的政治与战略走向。

从美国政治走向来看,今年这一年来,我觉得美国的政治既有远虑也有近忧。哪些是近忧? 第一个当然是奥巴马的弱势,2013 年是他连任第一年,就已经显示出疲态。今年,奥巴马的弱势全面地显示出来,弱势很复杂,包括制度的,国内政治的,但是跟奥巴马本人的性格和风格有关系。当年克林顿做总统的时候共和党也很不喜欢他,拼命地阻挠他。克林顿在政治上是老手,经常把共和党人请到白宫吃饭,还拍照留念,这些议员也乐于向自己所在选区的选民展示这些,以显示自己和总统的良好关系。但是奥巴马不喜欢搞这些,不太喜欢向共和党议员低三下四的。国会不通过我提出的法案,那我就动用总统行政法令;国会呢,一看总统动用行政令,就去法院起诉奥巴马(违宪)。所以说这跟他的风格有关系。克林顿出生于草根,会使用各种手段,而奥巴马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然后成为参议员,不善于玩弄政治。当然这些不好公开讲,但是如果我们分析为什么他这么快地弱势,而且弱地这么彻底,我想和他个人的因素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近忧,是奥巴马的团队,特别是他的国安团队的问题。奥巴马第一任期着眼于连任,相对比较开放,比如说让希拉里来当国务卿,以谋求广泛的政治支持。第二任期不需要考虑连任,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的亲信,因此赖斯进入其国安团队。

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可以说是参议员执政,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以及驻华大使等等,都是参议员。赖斯的能力和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奥巴马的决策困境。赖斯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她对国际关系不感兴趣,她关注的是全球问题。赖斯到访北京时,和习近平会面,花了二十分钟谈埃博拉疫情。习听了以后,认为赖斯把握不住主次轻重。再者,赖斯的风格也比较强势,因为她是奥巴马的亲信。包括克里,刚刚卸任的哈格尔都没有办法进入到国家安全决策的核心圈子。因此,奥巴马的国安团队成员构成导致其决策质量大打折扣。

第三个近忧,就是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全面控制国会,可以预见,党争将进一步加剧,奥巴马的行政效率低下,能够做的东西非常有限。有人预测,奥巴马在剩余的两年可能主要不是着眼于执政和治理,而是用来准备 2016 年大选。

至于远虑,我觉得两点可以注意。第一点,从今年来讲,美国的种族矛盾重新凸显。首先是美国传统的种族问题,就是黑人问题。作为黑人身份的奥巴马当选总统,大家认为美国的种族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有人认为会掩盖真实的种族问题,因为奥巴马并不代表真正的黑人,他是精英阶层的一部分。不管是弗格森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事件,还是最近发生在纽约的黑人枪杀警察事件,都表明黑人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第二个种族问题是拉美问题。奥巴马的移民改革方案将使一千多万非法移民慢慢成为合法的美国公民,这等于是鼓励拉美裔的人来美国,因为这些人迟早可以成为真正的美国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拉美裔的人治理国家跟美国传统的主流阶层盎格鲁撒克逊人治理国家是有区别的。如果美国今后的拉美裔和黑人比例一直上升,对美国国家的素质不是件好事情。

第二,美国政治精英的素质下降。2016 年的总统大选,好象民主党找不到别人,候选人是希拉里这样一个 70 岁的老太太,连个四五十岁的候选人都找不出来。共和党也找不到什么人,选了小布什的弟弟。反正美国总统大候选人还是这两个

家族的人。这反映了美国政治精英的固化和社会流动性的下降。所以今后还有没有可能出现克林顿这样的崛起于草根的总统,或者像奥巴马这样出身于精英阶层的人?我这么多年跟美国人打交道,发现现在在华盛顿主要的研究机构中的人员,还是 90 年代那一批人,那批人还在那里占据主要位置。这也是一个信号,说明美国的精英阶层在固化,美国政治精英的素质在下降。

接下来讲讲美国的战略走向。第一,我觉得,在剩下两年里面,奥巴马会坚持所谓的奥巴马主义。奥巴马主义主要是在海外的军事干预方面采集非常严格的条件限制,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涉及到美国的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能够用军事手段解决、要有其他国家参与。只有满足上述条件才能进行海外军事干预。不管奥巴马多么弱势,这点他一定坚持,而且他希望将此作为政治哲学和外交遗产留下来。

具体到欧洲、中东和东亚。在欧洲,就乌克兰问题而言,我认为对俄罗斯的政策主要还是以经济制裁为主,目前,一些制裁效果已经逐步显现,奥巴马没有理由放松制裁或者采取其他的军事手段。中东,在伊斯兰问题上还是以空袭为主。目标就是控制伊斯兰势力的扩张。除非出现巴格达被占领等重大事件,否则奥巴马不会出兵,他希望将美国军队撤出伊拉克作为自己的政治遗产之一。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和古巴戏剧性的建交之后,大家都在分析奥巴马下一个突破是否会在美伊关系上。习奥瀛台夜话之时,奥巴马也拜托习近平和伊朗领导人鲁哈尼通话,希望解决伊朗核武器问题,因为奥巴马认为,今后没有哪个美国总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要解决只有在他的任期内。这些更多地反映了奥巴马想要留下外交遗产的意识,所以这或许也是今后两年的看点。

东亚,一是朝鲜问题。美古建交之后,美国和朝鲜会不会建交。但是核问题奥巴马绕不过去,所以还是以稳为主,只要朝鲜不出现新的挑衅和刺激美国神经的举

动,基本上美国不会有更多的举动,也不打算在今后两年寻求更大的突破。二,美日关系,主要是完成《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两国本来希望在 2015 年年中完成 3.0 版的防卫合作指针,美日关系会有新的调整。三,在南海问题上,美国接下来可能会做两件事,一件是现在在做的,鼓励菲律宾和越南去国际法庭告中国,同时也鼓励东盟向中国施加压力,以在南海问题的解决上有更快的进展。另一件,美国明年有可能会利用南海问题来影响越南国内政治。越南下一任总书记阮晋勇是亲美派,美国希望其上台,要推阮晋勇上位就必须要打反华牌。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打反华牌,可以与阮晋勇在越南国内打反华牌里应外合。所以说,最近越南就南海岛屿争端提请国际法院仲裁的行为又开始了,这跟越南国内的政治走向有关系。四,中美关系。这次奥巴马访华讲得很明确,基本上还是两手战略,一方面要牵制中国,另外一方面是提供合作的机会,但是把牵制中国放在第一位。今年以来,从亚信峰会到亚投行,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妒嫉猜疑和敏感性在上升,在亚投行问题上,美国对它的盟友施加压力,不让它们参加进来。随着今后中国大国外交的大手笔逐渐展开,美国对中国的敏感、猜忌和防范都会增长。美国担心中国的举措是不是会重塑地区秩序。五、阿富汗问题。尽管有伊斯兰国的出现,但是奥巴马撤军的决心已下,会继续按计划撤出阿富汗,把美军从阿富汗撤军作为他的政治和外交遗产。从经济上讲,美国在亚太地区会有两个遗产,一个是 TPP,一个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宋国友: 我的发言主要讲美国在 2014 年的经济和中美经贸关系。首先看看美国的经济情况。前两天,美国公布了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大家都很惊讶,不明白美国经济突然间为什么变得这么好。从经过修正后的美国第三季度经济表现数据来看,美国经济增长率达到 5%。大大超过预期。

我先对 5% 的经济增长率进行梳理和点评,帮助大家更好地懂得 5% 是怎么回事,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个 5%,确实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高的一个每季度的增长速度,但是我觉得这个 5%,正如杨老师所说,美国经济形势起短落长,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准确。

美国经济的问题有结构性的问题,我们不能只看到 5% 的增长,更要看到 5% 增长背后是不是带来给美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往的那些困局是否得到了改善。比如说经济过度虚拟化,服务产业太多,以及是不是有新的真正的经济增长点出来。如果我们从这个 5% 的数据中看到这些变化,那么可以说,美国经济确实是在新的空间有新的发展。但如果没有,我们也不必惊讶,甚至紧张美国 5% 的季度经济增长率,毕竟这是在一个自 2008 年以来非常差的经济环境下的增长。

在 5% 的经济增长里面,个人消费提供了 2.2% 的贡献率,政府的消费则贡献了其中的 0.8%。两者相加,超过 3%,3% 占 5% 的 60% 多。这个数字是否说明美国经济已经逐渐摆脱了对消费的依赖呢? 不是的。对 2011、2012、2013 年的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比例进行加总会发现,2011 年,消费对美国 GDP 的贡献为 56%,2012 年是 41%,2013 年的贡献是 56%。从这个数字来判断,2014 美国第三季度这样的经济增长还是极度依赖个人消费。而我们知道,从短期来讲,个人消费的增长确实有助于美化美国的经济数字,但对于真正改变经济的空心化、虚拟化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第三季度,政府消费对美国 GDP 的贡献率达到 0.8%,我们看 2011、2012、2013 年,政府消费都是负的,也就是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是负贡献。而这次达到了 0.8%,和以前相比,一正一负,一相加,就多了一个多点,为 5% 的季度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多了一个多点,这是很大的因素。为什么? 原因在于奥巴马政府对医保资金的投入,没有被统计到第一、二季度,而是被放入第三季度,这就使得美国经济

在第三季度有了 0.8% 的增长。如果把这笔政府投入去掉,或者是平摊到第一、二季度,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亮丽度就会下降。2014 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是 -2.1%,第二季度是 4.6%,第三季度是 5.0,三者一加除以三,那么 2014 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么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判断。

那么美国的经济增长是不是创新取的驱动的呢?在 5% 的经济增长里面,能够反映出创新的就是新增知识产权,但实际上,这个增长率还是跟以往持平的。因此,作为对美国最新经济数据的解读,5% 其实并没有真正帮助美国脱离经济困境,也没有改善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只是把第一、二季度的数据挪到了第三季度,使得第三季度的增长非常好。所以,美国经济并未走向长期、稳健的复苏,中国 7% 的经济增长率相对于美国还是有优势的。

下面谈谈 2014 年的美国经济。第一,美国经济确实有一些好转,无论是消费、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出口。出口在第三季度也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第二,美国的就业率确实是有所提升,换言之,失业率在下降。一直以来,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是比较大的问题,但从最新的公布数据来看,失业率的数据表现不错,低于 6%。但是其实美国统计局的数据不一定可信。

失业率方面有几个问题。1. 美国的劳动参与率还是非常低的。劳动参与率指有多少劳动力真正进入到市场,从统计来看,其实只有 60% 左右,其余的人放弃找工作了。2. 就业率的提高靠的是提供很多低薪的工作岗位,高薪岗位的就业机会还是很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就业率上升,但经济收入没有增长;经济增速加快,但没有总体的真正的就业率的提高。这是失业率和就业率的悖论,也反映美国经济没有真正走向好的迹象。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美国确实是已经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甚至有人说明年是否会加息。如果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说明美联储对于美国经济的走势还是有信心

的,虽然这种信心也并不是那么强劲。

美国的出口确实改善了,这一点很出乎我的意料,但是可能在短期内无法真正得到改善,我当时的判断是说奥巴马无法实现五年内出口倍增的计划。09 年,奥巴马雄心勃勃提出出口倍增五年计划,但是从 2014 年来看,没有实现在 2009 年的基础上达到出口倍增的目标。

美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的有利变化:1. 企业投资加快,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季度,非居民的固定投资增长 5.5%,高于第一季度;第三季度也是很高的。消费者的消费意愿相对增强。虽然从长期来看,消费意愿增强对美国经济并不是好事情,但美国经济过去一二十年的发展所依赖就是这样的模式。我们很高兴看到美国经济终于回到了熟悉的模式,对于美国经济长期发展是不是好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对于美国经济指标的改善是好事情。

2. 股市繁荣。股市繁荣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指标上,因为在美国,股市有着特殊的意义,会改变美国的家庭净财富收入。美国家庭净财富收入已经上了新台阶,一方面是因为楼价的启稳和反弹,另一方面是因为股市创造的收益。美国家庭有了纸面的财富,就会去消费,这样一种机制使得美国经济在每年也会有增长的空间。现在标准普尔 500 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创了新高。

3. 美国制造业重新繁荣。中长期来看,美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也在进行。奥巴马是非常反感华尔街对美国经济过多的影响,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案来打击华尔街的势力。美国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在下降,更多的资金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也就是说,资金不是完全用于投资,奥巴马采取的措施显现出了促进资本回到实体经济的实效,我们看到,美国的制造业有所增强。2013 年,制造业占美国 GDP 的 13% 多,今年最新的数据没有出来,但总体上会占到 GDP 的 14%,应该说,这是不错的指标。同时,制造业对美国就业的拉动作用也比较明显,也促进了美国出口

的增加。

4. 页岩油气,这个问题看不太准。本来我们都说页岩油气革命是美国经济的重大突破点。但今年,油价大跌。今天最新的纽约油价是 54 美元一桶。美国的页岩油气革命是不是能够在这么低的石油价格上维持更高的竞争力,是不是有更多的资本流向页岩油气领域,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都不确定。包括美国制造业的相对成本优势,是不是能够借助它原来低廉的能源价格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竞争优势。中国的油价与国外同步,至少在能源消费领域的成本是降低了,2014 年,美国制造业在回流,成本下降、出口增加;2015 年,如果油价维持在 60 美元每桶的水平上,美国的制造业是不是还有超强的竞争力?

5. 财政问题。2012 和 2013 财年,美国的财政不行,但今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下降到 4860 亿美元,低于此前的预估,比 2013 财年下降 1/3,赤字低了将近 2000 亿美元,占 GDP 的比重从以前的 4% - 5%,下降到 3% 甚至更少,实现了五连降。这说明,奥巴马政府的财政整肃政策其实是起到了作用。

人们经常说美国在引领第三次工业革命,但始终也没有看到美国有突破性的爆发,真正形成制度的高原优势。按照经合组织的标准,美国高端和中高端制造业的比值从 09 年的 0.78 上升到 2013 年的 2.4。

总体来看,美国经济复苏加速,那么它的战略影响是什么? 1. 可能会有助于维持美国的大国地位。2. 美国可能有更多的动力和信心去打造以它为基础的新型国际规则,包括 TPP 和 TTIP 等。3. 会对国际贸易和跨境流动格局产生影响。美元升值使得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回流到美国,而市场预期 2015 年美国会加息,所以全球资本就会流向美国,这会对全球贸易格局,包括投资格局都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贸易格局来讲,很多国家改变对美国出口的模式,直接在美国投资,享受升值升息的双重金融收益。对于国际资本来讲,得益于越来越多流入美国的资金,美国更加有

充足的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又会增加美国资本的影响力。

下面看一下美国经济的风险。1. 国际原油价格下跌。2. 地缘政治风险,俄罗斯被逼急后,是否会采取非常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来进行反制,这也值得注意。与外部风险相比,更大的风险,来自于美国内部。首先,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在下降,出现了塌陷的趋势。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在 1999 年达到巅峰,之后稳步下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美国现在的中产阶级的收入水平低于 1989 年的水平。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复苏了,但对于构成美国经济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其实没有大的帮助。美国经济规模尽管已经超过 2007 年衰退前的峰值,但美国家庭收入连续五年下降。1979 到 2013 年期间,美国工人收入的中值仅增加 7.9%,远低于同期劳动生产率 64.9% 的增幅。也就是说,工人和中产阶级创造的财富流入了富人的腰包。这就说到了贫富分化严重的问题,美国的贫富分化有一个指标,即总体贫困率是 14.5%,这是 1965 年来,美国的贫困率连续五年维持在 15% 左右,这是很大的问题。另外,资本寡头的马太效应持续显现,有钱人更加有钱。

最后讲一下中美的经贸关系,有亮点,但也有难点。我对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总体判断是,双方在一些既定程序里开展谈判,解决一些问题。今天刚刚公布了中美商贸联委会成果清单,如果把中美商贸联委会的成果清单、经济对话的成果清单和习奥会的成果清单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美就是利用一些延续性的机制化的磋商机制,来具体地解决一些细节性的经济问题。现在已经不太谈诸如经济结构调整、储蓄率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议题了,因为双方发现讲了没用,正如杨老师提到的,和美国人讲哲学,他们不爱听,他们着眼于具体的问题。

就具体问题而言,我发现,诸如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开放,是三个成果清单里面都强调的,还包括很重要的反垄断的问题。这次中方是让步了,中国的反垄断将在

法律体系内对任何经济体采取统一标准。同时,采取的反垄断调查必须要和所有经济体进行沟通,并且给他们申诉的机会。我们本来预估习奥会时,奥巴马会把反垄断作为很重要的问题和习近平谈,但是两人的瀛台夜话有没有提及也不知道。从商贸联委会的成果清单来看,这个是重点内容。另外,这次的第 25 届商贸联委会对于知识产权的问题也谈得非常细。以前中国讲美国的东西不合法,是因为产品商标不合法,比如说商标都是英文的,没有标中文,按照中国法律,这是违法的。但以后,中国将不能用这样的标准来打击美国的商品。

还有是法律问题。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有很大的障碍,这次商贸联委会上,美国直接就说这个障碍不是来自于国会,不是来自于联邦政府层面,而是来自于州的层面,因为投资的管理和规范是由州的法律体系所规范。所以中国在美投资的企业,如果还碰到投资障碍和问题,就直接去和州政府、州议会和州法院打交道,不要再找联邦政府和国会。也就是说,以后中国在美投资遇到的问题,需要选取一个更为精准的对象去进行沟通和协调。

气候变化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习奥会期间发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显示,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将在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但没有提供非常清楚的路线图,只是大致提供了一个时间表。不管怎样,这样一种行动为中美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注入了很多动力,也提供了很强的信心,是大手笔的合作。

刘 鸣: 总体来讲,美国的亚太政策,还是一分为二。一方面,美国的政策在发展,在加固,但是今年遇到了很多困难,可以说步履维艰。比如国内问题凸显,中东问题和埃博拉疫情让美国有些措手不及。另一方面,这一系列的问题使得美国坚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后续动力不足,所以美国要做出一些调整。今年,美国在亚太再平衡政策上出现了更多的高调的喊话,但是中国主动塑造亚太地区秩序

的力度在加大,美国在应对中国的塑造方面有点跟不上,很多时候显示出被动,可用的手段也不是很多。

我主要从安全和军事,以及经济这两个大的方面对 2014 年美国的亚平衡战略进行点评。首先看安全和军事。一、美日关系。年初奥巴马访问日本时,本来想通过《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表示,给日本信心,也给中国某种警告,就是说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当然,美国也想换取日本在 TPP 谈判上的让步,只是由于国内反对,日本没有做出让步,所以奥巴马访日并不是太成功。但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决定要对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做出更高级别的表态的信号已经发出来了。

关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问题。美国说这是日本提出来的。日本认为,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周边地区的范围发生了一定变化,不再是模糊的“周边地区”的概念,今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将不断扩大。目前来看,自民党在日本国会占有绝对的优势席位,明年上半年,日本将修订安保法案,以配合解禁集体自卫权,消除原有的灰色区域,逐渐实现和美国的无缝对接。这样,如果今后亚太地区发生冲突中,日美双方都要有明确的战略分工。2014 年 11 月份奥巴马的东亚之行,从 APEC 到澳大利亚,美日澳三方会谈中特别提到了三边的军事和技术合作,随着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则的修改,美日澳将加强在先进武器的出口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我认为这也是新的发展。在军事技术方面,亚太地区新一轮的竞争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中陆续展开。

二、军事部署。从美军基地来看,2014 年 4 月,奥巴马访问菲律宾,与其签署了为期十年的《加强国防合作协议》,规定美国军队不能在菲永久驻扎或建立军事基地,但可以以临时和轮换方式在菲律宾活动。这个协定也是美军从克拉克基地撤退以后最重大的部署,等于又回到了东南亚。很多尚在谈判中的美军基地非常

靠近中国的岛礁,这显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在军事部署方面有明确的发展。

再看美国军舰的部署。今年美国军舰的更新速度在加快,除了将 60% 的海军力量逐步转移到亚太地区,目前亚太地区的舰艇的数量是 50 艘,最终发展到 65 艘,当然这个数字并不是很重要的数字。美国的国防费用在缩减,海军的数量都在减少,所以增加的意义不是很大。但在换防的过程中,尤其加快了在日本的冲绳和嘉手纳基地的武器装备部署和更换,这会使中国东海的压力增加。从中国海空方面的反应来看,一方面,我们感觉压力很大,想要寻求突破。另一方面,面对这样的压力,我们也担心会在钓鱼岛发生一些问题。另外,美军正在加快部署 P-8 和 F35;加快使用东南亚国家,诸如新加坡樟宜的海军基地等,我们看到美军军舰频繁进出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基地,今年美军的轮换时间是六个月,预计明年轮换的时间会变长。

接下来看美国的军事演习,比较突出的是美军的“勇敢盾牌”演习。美军的军事演习实际上是在测试其海空一体战的理念。美国军方内部对“海空一体战”的理念有很多争论,比如美国陆军认为,针对中国的战争最终还是要着眼于应对中国的陆军。争论到最后,军方比较倾向于海空联合作战。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海空一体战的理念在逐步向作战方向发展,美军在“勇敢盾牌”的演习中都在加快实施这些理念。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航母部署也在加快,包括里根号,乔治华盛顿号,再加上在圣地亚哥部署的罗斯福号等等。虽然美国的国防预算在削减,但武器装备方面在加强,美军称之为“第三次抵消战略”。也就是说,中国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美军在数量上和中国相比会逐渐丧失优势,但会在质量和优势上进行努力。“第三次抵消战略”就是在技术上,比如太空武器方面会加大投入。

三、南海问题。我和来社科院访问的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物的助理国务

卿拉塞尔就南海问题进行了交流。我说,今年美国多次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得咄咄逼人,老是咄咄逼人地针对和批评中国。拉塞尔说,美国国务院也很无奈,因为中国在对南海岛屿上的设施进行加固。我说,越南和菲律宾不断搞基地和港口建设,美国不吭声,但是中国一搞建设美国就批评中国。拉塞尔说,越南和菲律宾搞的建设也就一两英亩,可是中国一搞就是 400 英亩,再加上越南和菲律宾的海军远远不及中国,而且中国也不按照地质地貌的要求去确定范围。

针对在所谓的九段线内采取的行动,美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除了在南海问题上拉高调门,还和菲律宾、越南加强了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合作。二,美国公开支持菲律宾、越南将南海领土争端提交国际法院仲裁的行为。拉塞尔提出冻结南海地区军事基础设施的发展,他表达了美国政府对南海军事发展的担心,即如果中国在永暑礁进行的岛屿建设等类似行为继续发展下去,将改变南海地区军事战略格局。拉塞尔认为美国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限制这种势头的发展,但是手上的牌有限,美国无法真正使这个问题国际化,只能是更多地鼓励东盟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 COC 谈判等。如果明年中国在南海军事部署上有更多行动,那美国也会开展更多的军事行动。南海问题是美国今年着重关注的,但是力量跟不上。

四、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调整。按照拉塞尔的解释,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是一个综合的战略,并不是针对中国的,但确实是对中国造成了消极影响,但这不是美国的本意。所以美国现在在采取措施,减少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军事色彩,使再平衡战略更具有综合性。

另外,奥巴马在和习近平的会谈中提出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是中美大国关系,实际上是把中美大国关系和亚太再平衡战略放在一起。希望中国不要把亚太再平衡和中美大国关系对立起来,美国将加强和中国的接触,对中国的政策行为进行合理的塑造。美国认为中国有权对亚太地区进行更多的塑造,但是中国的塑

造必须建立在现有基础之上,不能另起炉灶,不能像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上说的那样,“亚洲安全是亚洲人的事”,更不能把美国排除。当然,美国也将逐步改变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采取的针对中国的对抗性政策。2014 年 3 月 4 日,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发表讲话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难以实行,受到很多牵制,比如财政困难等等。尽管事后美国政府否定了这个讲话,但我认为这反映了美国的真实情况,助理国防部长应该是感觉到美国继续在军事上推行亚太战略是比较困难的。

五、亚太再平衡的经济方面。美国今年切实感觉到中国的经济手段越来越多,比如塑造了“一路一带”。TPP 谈判陷入了困境,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拿到国会快速通道授权,当然随着共和党掌控国会,今后拿到授权的可能性比较大。另一方面,TPP 谈判首先取决于日本,如果安倍的第三支箭,也就是体制改革,特别是农业改革能够调整好,那么日本在谈判中的回旋余地更大。按照现在的进展来看,明年第一季度很难达成 TPP 谈判。另外,跟越南和马来西亚的谈判上也存在很多问题。在中国的推动下,美国对两国 BIT 谈判的积极性和意愿在增加,但最终签署协定的障碍还是很多,比如市场开放、国企改革、人民币自由兑换等。

我认为,TPP 最终能够谈成。拉塞尔虽然不分管经济,但他也认为目前的进展比较快,最后就是政治决定的问题。TPP 签订以后,中美在经济上领域,比如亚太自由贸易区、RCEP, 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方面会有更多的呼应。我们的央行对于财政部搞的 AIIB 意见很多。央行认为, AIIB 今后能不能上市,如果出现问题能不能退出,还有很多运行机制的问题,央行搞的“丝路基金”比较灵活,财政部搞这样一个地区性银行,缺乏可供借鉴的经验,今后如果碰到巴基斯坦这样的小国家要求贷款,那么是否批准贷款? AIIB 能不能维持下去? RCEP 的谈判也牵扯到很多小国家,比如老挝和柬埔寨,所以这个谈判进展也不会很快。如果 TPP 谈判能够达成,而美国国会也批准的话,那么至少在 2015 年下半年到 2016 年,中国

将会面临经济上的过渡期,所以需要加快中美经济协调,包括在 BIT 上实现突破,这样可能会有助于避免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失势,更好地应对 TPP 对整个亚太地区经济格局的影响。

下半场是自由讨论。

潘忠岐: 我有几点评论。第一点关于中美之间的战略文化的比较和外交哲学的比较。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有大局观,但是大局观可能有一点不一样。美国人还是比较强调明确分工,各个部门间的配合,中国人喜欢集中力量干大事。中国人强调战略布局、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美国人强调的是具体利益。可能我们跟美国人聊哲学他们没有兴趣,但是研究中美关系落实后面的具体战略会有帮助。

第二点评论,中美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主要靠中国,因为美国对此的兴趣不是很浓,尽管美国没有明确说不。1997 年,也就是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时期,中国曾经尝试着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是没成功。我记得非常清楚,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就在复旦美国研究中心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讲的很热烈,但最后不了了之。这次应该说中国有一个很好的时机,奥巴马在外交上比较弱,特别是最后两年,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能够做出动作出来的话,可能可以给中美关系搭一个框架,应该说这对于中国将来发展中美关系是很有帮助的。

第三点中国的“一带一路”,这跟中美关系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它是构建中美关系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支点。中国对美关系,我想了一个词,叫“针锋不相对”。针锋相对是美国人的思维逻辑。比如米尔斯海默就认为中国崛起之后会和美国争锋相对,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是中国人的思维是避开锋芒跟你竞争,我们要想办法设计一种替代路径和替代选择,不会直接和美国主导的 TPP 争锋相对。更不会阻拦美国去完成 TPP 谈判。“一带一路”这个替代性的选择,可以给地区的

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提供一种可能性,就是你不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可以同时受益于中国和美国。TPP 中国人也没有参加,中国欢迎美国参加 AIIB,但是美国人不会参加,美国人也知道中国不会参加 TPP,美国在说服日本、澳大利亚等不要参加 AIIB,中美等于是在亚太地区玩经济游戏。但对其他的大多数的国家来说,它们都可以选择,不是非彼即此,不是一一定要在中美之间站队。《国家利益》上最近一篇文章让美国人去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没有西方的力量,都是中国在做,比如金砖国家、“一路一带”。其实中国人并不是要重新安排一种秩序来取代美国的一套东西,而是弥补美国驻代的世界秩序中的缺陷,然后慢慢地提供一些可替代的选择。我认为学界将来可以深入研究一下中国怎么把“一路一带”变成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抓手或者是支柱。当然也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否有道理,在此请教各位,谢谢!

韦宗友: 我简单谈谈一些或许不太成熟的看法。在亚太地区,中美在战略上的竞争在加剧,但战术层面的合作呈现也加强的趋势。一个是战略性的加剧,另外是战术性的加强。就战略竞争而言,我认为在亚太地区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亚太的安全秩序。11 月份美国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发布了年度报告。今年的报告特别长,有 600 多页,基本的观点就是说中国想要取代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在亚太另起炉灶。该报告还评判了中国在 2014 年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亚洲安全观。

第二个亚太秩序很大程度上和海洋问题有很大关系。美国作为一个全球海洋霸权,特别是西太平洋的海洋霸权,但面临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中国越来越积极地维护海洋权益等挑战。中美在亚太海洋秩序问题上是有很大的分歧,双方目前谈的主要是技术性问题,比如美方主张海洋航行自由,但是中国说不存在航行不自

由的问题,美国的商船本来就可以自由航行。可是美国人说我们谈海洋不是谈这个,主要是谈中国在专属经济区里面抵近侦察的问题。事实上美国从全球海洋霸权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亚太经济秩序,美国搞 TPP,很大程度上想抵消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在地区的 FTA 中的作用。另外中国在地区创设了一些列机制,包括亚投行、丝路基金等等,在美国看来,中国开始在制度层面对原本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秩序提出了某种程度的挑战。

就战术,或者说务实层面的合作而言,中美今年在逐步落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很多务实性的合作都看到了成果,比如说频繁的高层互动、机制化的交流等;在经济领域,加速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加强反腐合作;在安全领域,中美确立了海空相遇行为准则和重大海上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在全球问题上,两国加强了对诸如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的合作。

2014 年中美关系有一个特点,基本上以七月份进行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分界线。上半年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包括言词上激烈的唇枪舌战比较多,到了战略和经济对话的时候,基本上稳住了言辞激战的态势。到了 11 月份, APEC 和习奥会使中美关系迎来了小高潮,可以说是低走高开。前半年,双方存在很多矛盾,特别是在菲律宾和越南问题上的冲突特别多。在香格里拉的对话上,中美唇枪舌剑,火药味很重。下半年,随着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展开,再加上 APEC 会议给中美关系改善营造了良好氛围,习奥会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也让我们看到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取得了一些务实的突破。

展望 2015 年,我相信,中美在务实合作层面将会加强。王毅外长在出席 2014 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的题为《盘点 2014: 中国外交丰收之年》的讲话上,在谈及大国关系时,把中美关系放在中俄关系的前面,之前中国在谈

大国关系把中俄关系放在第一位,中美关系放在第二位。这次王毅外长的讲话又把中美关系放在了第一位,现在俄罗斯遇到问题了,奥巴马的对俄政策的确是对俄罗斯产生了影响。尽管奥巴马没有很强硬,但却使用经济手段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中国在对美问题上可能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美国自身实力是否衰落,当然领导风格也有很大的影响。美国的实力很强,中国的合作意愿就比较强,美国的实力衰落了,中国的自主性会上升。二和俄罗斯也有很大关系,因为近年来中俄战略协作在加强,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俄罗斯很强硬,那么中国也会比较强硬,但是现在俄罗斯遇到了困难,所以明年中美关系中合作的一面会加强。

邵育群: 现在的中美关系里面有一些就是超出双边的因素。跟中美关系相关的一组三边关系其实对于处理中美双边关系非常重要,但我们现在注意的还不够。我们在讨论中美关系的时候,比较注意的是几个突出的三边关系。中美俄,中美欧,中美日,这些三边关系已经得到充分重视,是可以调动的影响到中美关系的第三方力量,而这些第三方力量确实给中美关系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比如说中日钓鱼岛争端,乌克兰问题,中国花了很多精力来处理这些问题,也想了很多办法来调动欧盟以及欧盟几个主要的成员国来影响美国的政策,这些都做得不错。但我觉得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三边关系,我们现在没有投入必要的时间和精力。这是我到中东访问以后发现的问题。在伊朗,我们访问团和伊朗谈了美伊核谈判,包括 5 + 1 进程的问题。我非常惊讶的是,伊朗对中国在伊核谈判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的反应很不好。说的好听点,是说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在做旁观者,没有出力;说的不好听就是中国想尽可能拖延美国和伊朗达成核协议,从中获益。伊朗的这样的反应让中国的中东问题专家非常恼火,认为伊朗人简直是不理解中国帮他们承担了

多少压力。如果不是中国坐在那里的话,伊朗的压力会大很多,日子会更难过。

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们在中国伊朗双边关系做的非常不够,导致中国在中美伊三边关系中受到很多来自美国的压力。美国希望中国对伊朗施加影响力和压力。因为中国跟美国有共同的利益,所以中国就到伊朗那里去做工作,可是中国又不愿意和美国靠那么近。当然中国与伊朗有共同利益也有分歧之处,这就导致中国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吃力不讨好。

所以我认为,第一,在中美关系进入新型大国关系的阶段的时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也要升级。中美关系如果升级到 2.0、3.0 版本,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也要相应升级,否则,将来可能因为中国和第三方的问题引起中美关系紧张,对中国的地区和全球的外交都非常不利。习主席在亚信峰会上讲的亚洲安全观另美国非常紧张,美方要求中国说明说这话的意图。我们看到,伊朗接的非常快,说中国说了,“亚洲人的问题由亚洲人解决”,也就是说伊核问题和美国没有关系。中国在中伊双边关系上没有进行相应的升级,导致中国在伊核谈判中显得比较被动。

刚刚大家提到了“一带一路”,实际上一带一路里面有好几个支点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伊朗等,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非常重要,这些双边关系同时又和中国、美国组成三边关系。这些三边关系对将来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有重要意义。

但是目前我们对于这些重要的三边关系的关注太少。实际上中国应该利用这些国家来调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不要总是让美国给中国提出要求,要求中国去做某个国家的工作,中国应该主动经营好双边关系,从而推动三边关系更好的发展。

另外谈一下中国影响美国国内政策的问题。目前,拉美裔在美国的人口结构中占多数,而且这个比例还在迅速上升。从美国和古巴的关系改善来看,中国要去

影响和塑造美国的内政外交,需要加大对拉美裔的政治人物(如国会议员、国会议员的助手)和拉美裔社会团体的接触,因为这些人会影响到各自的国家,这对开展中国、美国和拉美国家的三边关系也非常重要。当然,现在影响美国国内政策的点也很多,而且变化很快,我们做工作的时候要更加敏感,及时找对点下功夫。

吴苑思:我想借此机会问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国内对于中美关系的研究是不是存在一些风险。中国战略界,或者说精英,或者说学术圈内的人对美国的实力、国内政治、中美关系的看法的观点非常相似。但是我在参加欧美同学会的讨论时,(那里有很多在美国呆了很多年回来的人),在看网上的,(比如说共识网等比较自由的网站),我感觉这些评论跟圈内的主流是不太一样的,当然这个主流也不是保守,很多人都持比较自由的判断。我不知道国内学者在做中美关系研究或者战略研究时,会不会出现观点固化的倾向。我最近也没有太长时间呆在美国,所以不确定我们是否正确地判断了美国的趋势,以及中美实力对比的情况,以及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评价。

第二,奥巴马政府的弱势是否一定有利于中国?从具体问题的博弈上来讲,美国的弱势使中国有机会进一步推进自身利益。但我认为,奥巴马政府本身代表的一种理念,至少他在上台时是持一种比较左的思维方式,想要谈全球问题,谈全球治理。但是随着奥巴马在美国的弱势,他这样一套思维方式不得人心,而美国越来越往战略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方向变化,这对于中美关系,或者说中美之间的博弈到底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我想也许要做其他的评估。总的来讲,我觉得中国应该继续引导美国在全球治理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诸如气候变化、能源布局、埃博拉疫情、核不扩散等全球问题上,我认为全球治理的思维方式是超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也许对中美关系和中国自身的发展还是有利的。

第三,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在上升,但是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在下降,贫困率在上升,这个背景对于 2016 年美国的大选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通常来讲,美国经济问题是执政党更替的其中一个理由,对于美国的中下层而言,民主党执政比较有利,对富人阶层来说,共和党执政比较有利。考虑到中产阶级生活水准下降,拉美裔人口比例上升,即便奥巴马政府做的不太好,美国经济复苏和增长依旧乏力,但 2016 年民主党获取选票的机会仍然会比较大?

罗小军: 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写的是中美新型大国经济关系的生成,我从中国的角度把中美经济关系分成几个阶段,包括中美经济外交的初始化,正常化、机制化、包容化,以及 2013 年以后的善治化。对中国而言,现在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亚洲投资银行等,是为地区提供公共基础设施产品;对美国而言,更多的是从中看到一些竞争的因素。

从 2007 年左右开始,中美经济关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包容化,最重要的因素变化在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2007 年左右,从世界第二上升为世界第一,也就是说,中国对全球新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多,这就导致全球市场话语权的变化,导致中美经济外交关系发生变化。但就经济总量来讲,美国还是第一,而且是全球第二、三、四大经济体的总和。所以从经济上来讲,美国还是一超,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还是掌握在美国手中。但是从 2007 年起,中国的经济新增量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跃居第一,美国成了第二。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回升的势头能够得到一段时间的稳固——考虑到经济增长会有波动——那么它增长八到十年就非常不错了,在经济增长轨道上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我认为,谈太长期的经济增长没有意义。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美经济总量在 2015 年会相等;根据 IMF 的统计,

2014 年中美经济总量是相同的。但是如果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得以保持和稳固,会导致中美在全球的地位和话语权发生深刻的变化。

中国学者惯有的思维是对美国任何好的事情都持怀疑态度,这样的思维方式很不错,也有助于更好地看清事物的本质,但我们需要做好这样一种假设,如果美国的增长优势能够得到维持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想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未来四到五年,美国的经济增长趋势如果那个维持下去,那这是因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发挥了作用还是美国经济增长规律使然?如果美国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基本面的改善,那这对于今后一段时间内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今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优势可能没有过去几年那么强大,这就对中国的产业会形成很大的挑战。

接下来我想谈谈中美企业并购和投资的数据。在统计方面,没有哪个统计机构的数据是最权威。因为就中国对外投资统计而言,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商务部只能统计到从中国大陆出去的投资。比如说复星投资在香港通过复星国际投资进行,这样就不在中国的统计范围之内。从这点来讲,我们现在在做的并购投资统计,很多数据肯定会比商务部和发改委的数据更全面。

投资的变化可能对中美经济关系的影响非常大。过去几年间,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即 FDI,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以间接投资,比如购买国债证券等东西。过去五六年,中国对美的投资急剧上升,2007 年后美国对华投资波动大幅下降,这种情况对于中美具体某个具体谈判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过去中国对美国,包括其他很多国家做招商引资的工作,给予外资很不错的政策和法律保护。但是现在中国企业出去投资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怎么签?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中有一条关于国有化的问题,就是说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政府把外资企业没收了,

那么政府需要支付多少补偿？是完全补偿还是适当补偿？谈判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上升，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具有可能性，也具有现实紧迫性。就直接投资总量而言，中国对美的直接投资急剧上升，但总量很小。

直接投资分为两大块，一种是绿地投资，也叫创建投资，就是新开一个企业；一种是并购投资，不新开企业，只是去购买当地公司的股权。如果投资所在地的很多因素，比如对商业规则不确定，那么企业可以采用入股的方式，寻求分享增长机会。中美之间的绿地投资绝对量在下降，而并购投资在急剧上升。

第二个，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中，民营资本的力量在快速上升。这其中存在很大的概念上的问题，国营企业是国有的，但民营企业不是民有的。从制度上来讲，民营资本随时都有可能被政府收走。根据美国荣鼎集团的数据，（一般认为这家公司收集的中美投资数据是最权威的），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2011 年，民营资本投资金额占中国对美投资总量不到 50%，2012 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民营投资占 59%，2013 年占 76%，目前 2014 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是我大致可以从并购数据中推算这个比例，当然尚未进行深入的研究。以 TPP 为例，TPP 中有三点很关键，一是国有资本不得入内，但现在，中国对美投资中民营资本占据了主流，这会对中美 TPP 谈判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中国成为 TPP 的一个玩家是必然的，也是符合的中国利益的。

从 2014 年的并购投资来看，民营资本占了其中 44 宗，（总共 50 宗），国有资本只有 6 宗。目前，中国的大型民营企业资产 70% 都在国外，在国外从法律和意识形态来讲，这是民有的，不是民营的，而在国内就是民营的，不是民有的。

并购投资快速成为中国对美投资的主流。根据荣鼎公司的统计，2013 年中国

对美直接投资额为 140 亿美元,其中 76% 的投资金额和 87% 投资宗数来自于民营企业。2013 年,中国对美投资一共 82 宗,其中 44 宗为并购,占了大约 50%。目前,今年的统计到 12 月为止,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 590 宗并购案中,有 44 宗是民营企业完成的。从行业分布来看,2013 年中国对美投资主要分布在非常规油气领域,包括购买油井和页岩气。美国政府在这方面非常开放,所以说,其实美国联邦政府不太在意这种投资(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我自己有一些体会,2012 年的时候,我们曾组织一批企业赴美考察,直接和州政府交流。为了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州政府甚至会专门立法以规避联邦政府的法律,所以说美国的州的招商引资力度和服务态度不亚于中国。今天早上的新闻说,上海各街道的招商引资将不列入考核范围,而美国恰恰是从奥巴马政府开始,成立了一个名为“Select USA”的办公室,专门进行招商引资。

那么 2014 年的并购投资中,中国企业是如何行动的呢?我们发现,中国企业的 50 宗对外投资中,有 19 宗是信息技术行业的,10 宗是地产行业的,9 宗是大健康医疗行业的,4 宗是金融的,其余的分布于其他行业。我想,这样一些变化也会对于双边商务谈判带来直接的影响。

吴心伯: 经济方面补充两点,第一,美国第三季度 5% 的经济增长中,军费占了很大一部分。美国的预算周期是从第二季度,也就是四月份开始一个新的财政年度。而军费开支主要是在第三季度,所以一般来说,第三季度的增长是最好的。但是第三季度经济增长 5% 并不意味着年度经济增长就是 5%。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有人问,是不是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都会是 5%?我说这是两码事,因为第三季度往往是例外。第二,中国研究美国经济的学者看法比较乐观,认为美国经济已经

恢复过来了。但有一个观点认为现在的美国经济已经不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了，这是我们的研究非常需要关注的。美国经济过去有周期性的现象，但是现在美国经济的增长不能用过去的周期性现象来解释，包括这次的经济复苏，也不一定是周期性的。

焦世新：我也想谈一下美国经济 5% 的增长。从刚才宋国友老师分析的数据和各个指标来看，不管是美国政府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好还是增加政府采购也好，都需要增加政府支出。那么美国政府的财源在哪里？很重要一点就是量化宽松政策，也就是通过印钱给美国经济输血，我想这对美国度过难关是很重要的。可以说，美国的金融霸权又一次救了美国。

就美国的亚太战略，我想再补充一点，关于人权和民主。今年，美国从军事上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奥巴马在开完北京 APEC 会议之后访问了缅甸，美国对缅政策采取了两手，一手是施压，另一手是又给予缅甸一亿多美元的援助。美缅关系的改善和缅甸的民主化，应该说是之前几年的美国亚太平洋平衡战略的亮点。2012 年奥巴马第一次访问缅甸时，解除了很多对缅制裁，但从 2012 年至今，缅甸国内的政治进程停滞下来，所以今年十月份美国又开始制裁缅甸，包括一些缅甸前军政府的要员。根据缅甸法律，昂山素季不能参加选举，因为她的儿子是英国国籍。从这点上看出，美国还是在缅甸力推民主和人权。

我也看到了一些有关联合作战的新闻报道，这其中牵涉到美国的陆军将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发挥什么作用。一般提到再平衡战略，就认为是海空一体战，实际上从今年 9 月到 11 月，美国陆军通过“东方之盾”的演习使其装备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建立一种所谓的“太平洋通道”计划，或者叫做“太平洋

路径”,以发挥陆军在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作用,这是一个新情况。

还有一点关于日本,涉及美日同盟深化的问题。日本修改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和美日修改防卫合作指针是有关系的,实际上是美国在推动日本修改宪法解释。2013 年 10 月,美国和日本就达成共识,两国修改防卫合作指针要建立在集体自卫权的基础上。修改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需要日本内阁通过,所以 2014 年日本就着力推动这个事情。奥巴马和哈格尔在今年四月访问日本的时候,奥巴马非常高调,公开声明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这除了是给中国警告之外,还在于影响日本国内民意,以帮助安倍政府推动修改宪法解释。我们看到,安倍政府修改集体自卫权宪法解释的努力基本上成功了。明年五月份,美国和日本要对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订,以扩大日本的作用和地位。

总的来说,2014 年的全球战略布局发生了变化,所以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因为现在受到了更多因素的牵制,包括中东和乌克兰,再加上中国在战略上更加主动出击等等。美国亚太战略可信度一直受到质疑,但美国一直在说它的全球战略重心还在亚太。在 2014 年的 G20 布里斯班峰会上,奥巴马发布声明说美国的战略重心仍在亚太,可见,美国亚太战略的可信度一直受到质疑。从 2014 年美国推进其亚太战略来看,经济进展不如军事进展,所以其亚太战略中的军事色彩还是很明显。比如在悉尼进行的 TPP 谈判,新闻报道说取得一定进展,但实际上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恐怕要拖到 2015 年,而 2015 年能达成就很不错了。所以奥巴马在北京 APEC 会议上对亚太自贸区始终有所保留。总的来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到关键时期,因为美国的获益没有预想的那么大。明年美国智库和学者可能对美国亚太平洋平衡战略进行评估和反思。

王联合：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第一，刚才杨洁勉老师提到构建中美相似，或者说相同的外交哲学，这和我们通常的认识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我们的认识中，中美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完全对立的。我想请问杨老师，应该如何去构建共同的或相似的外交哲学，从哪方面着手，以找到双方都能够认可和接受的哲学的概念。

第二，吴老师提到了美国政治精英的素质下降的问题，我完全赞同。我认为，美国的战略精英和学术精英也面临这样的问题。随着黑人和拉美裔人口在美国的增长，美国的治国理政水平也会下降。实际上，十几年前美国学者亨廷顿就在他的著作《我们是谁》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亨廷顿提到了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种族认同问题，按照美国目前的人口增长来看，到 2050 年左右，美国的少数族裔就会占美国人口的一半甚至一半以上，到那个时候美国还是美国吗？亨廷顿的这个认识很超前，十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是目前，这个问题好像不能提了，也没有中生代的学者提出来加以思考，可能有政治正确上的考虑。

今后两年，奥巴马致力于留下一些外交遗产。美国已经采取了一些举措，比如说启动了美古关系正常化谈判。另外，还让习主席传话给伊朗，让美伊双方坐下来谈一谈等等。那么奥巴马的这些想法在美国政府的层面上是否能够行得通，尤其是在遭到国内保守派反对的时候。当美国宣布和古巴启动正常化谈判的时候，美国国会马上就做出了反应，称将从立法的角度对奥巴马政府的行为进行限制，首先就是阻挠美国驻古巴使馆的设立，其次是要阻挠美国驻古巴大使的任命。明年 1 月，共和党将全面掌权新一届国会的参众两院，奥巴马想要推进奥巴马主义，留下外交和政治遗产的想法，是否能够达成目的，是否会弄巧成拙，导致在政治上陷入更大的争斗中去。伊朗是美国的宿敌，奥巴马想做出新的动作，可能国内的压力

和牵制非常大。

除了上述两个问题之外,我还想谈谈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考。前几年美国有人提出 G2 的说法,而中国有人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称为 C2,但是美国官方层面还没有接受。美国认为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没有实质性内涵,就算有内涵,似乎也是对美国设了陷阱。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今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记者会上引用了中国的话,说“美国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看看中国对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做出了什么行动。”2008、2009 年的时候,美国提出了 G2 的概念,2009 年,温家宝总统公开反对了这个提法。为什么双方在发起倡议时仅仅只是隔空喊话?我觉得还是因为两个国家提出的理念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没有真正兼顾到对方的需求。所以我认为,双方在双边关系上发起新的倡议,构建新的关系模式时,需要真正从对方的需求和利益出发,需要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找到双方真正能够对接和融合的点。这样才能制定有效的政策,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一个平台,以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汪晓风: 我记得奥巴马在 2013 年提到,他会在 2014 年年初会推出其第二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现在一年过去了,我就想问问吴老师,为什么没推出?或者说是卡在什么地方了?第二,关于奥巴马的政治遗产问题。现在奥巴马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在国会失去了控制权,但我们如果从历史上来看,里根总统在他第二任期的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在国会的席位比奥巴马现在还要少,但是里根总统在其第二任期的后半期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即结束了美苏冷战。所以,奥巴马的政治和外交遗产可能和他个人的能力和政治抱负是有关系的。在看看克林顿的第二任期,我记得国会参众两院只有一院是民主党控制的,但是克林顿做了一个成功

的协调者,所以也不妨碍他在第二个任期后半段做成一些事。

奥巴马在考虑到他的政治遗产时,考虑到的第一个可能就是原创性,也就是奥巴马提出来原创性的美国战略。我认为这就是美国的亚太平洋战略。奥巴马在其任期内首先提出重返亚太,包括 TPP。第二个是突破性的,突破性的就是美古关系。有评论认为,尽管奥巴马失去了国会,但他可能会放手一搏,做出一些大胆的举动和决定,反正他也没有什么压力,只要是在行政权力规定的范围之内的事情,都可以做一做。那么是不是还有别的突破性的外交进展,下一个和美国改善关系的国家会是谁? 刚才学者们也提到了伊朗问题,那我想我们可以拭目以待。第三是奠定性的,就是做一些能够奠定格局的事情,比如说重塑一种格局。如果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能够实现奥巴马的预期,那也可以说是重塑了一种格局。

国内遗产方面,奥巴马政府的医改已经有所推进,移民政策方面,他的行政命令已经做出了,国会要推翻也很难。另一个国内遗产是经济增长。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是四千多亿美元,基本上算是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比较低的水平,当然这和奥巴马政府的财政政策有关系。可能低油价也对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2014 年 6 月以前,国际油价是 100 多美元一桶,现在则是 50 美元一桶。一定程度上使美国的经济成本,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采购成本减少。我认为美国经济增长在奥巴马的后半段任期会有延续性。

吴老师刚才讲到奥巴马主义,主要从军事上讲,就是限制军事手段的使用,对军力使用施加严格限制。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吴老师,是否可以在其他方面,比如外交上,对奥巴马主义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论述。

潘亚玲: 我想请教杨老师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您怎么看待美国的外

交哲学？从现在学界的研究来看，不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就是威尔逊主义，大多数都是受到西方或者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作为一个资深的中国学者，您如何判断美国的外交哲学，然后再从这个基础上去分析中美外交哲学的相似性？

吴其胜：美国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上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是为什么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最大的障碍主要来自联邦政府？联邦政府跟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分工，联邦政府主要考虑投资对于国家安全的问题，而地方政府主要考虑财政补贴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在刚刚出炉的《第 25 届中美商贸联委会联合成果清单》上有这样一句话：美国欢迎中国的投资。然后马上就转到法律服务的问题上了，原话是这样的：“在美国，法律服务主要由州政府进行监管，联邦政府在法律服务市场开放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也就是说，美国的地方政府对法律服务投资有很大的限制，但在其他领域的投资中，联邦政府的发言权也很大。

刚刚有学者提到了中美关系应当超越双边，关注三边。我认为我们还可以超越三边，关注地区性问题和全球议题。过去一年，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多于合作，比如说两国在塑造经济秩序上的努力，中国致力于创建 RCEP，美国则全力推进 TPP。但是在全球议题上，中美的合作取得很大的突破，双方共同推动巴厘岛协议的谈判。中美就《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达成的共识，当然还包括气候变化问题。我们看到，中美在全球议题上合作的空间很大，也是中美在深化合作上可以发挥潜力的领域。

杨洁勉：下面我做些简单的回应。哲学是所有科学的科学。第一，复旦大学是中国引进消化和推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桥头堡。针对潘亚玲提的问题，就我

自己而言,我写了 35 年的文章,但我从不用什么理想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等理论,可是我也没用出我自己的东西来,现在还在上下求索。刚才潘亚玲讲的国际关系中的几个主义,恐怕还不是哲学层面的,是理论层面的。哲学实际上是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和基本看法。

刚才有学者问,如何构建相似的外交哲学。我讲三点。第一,应该发展老常态下的相同、相近的传统哲学。中国有五千年对世界的哲学思考,我看到一篇文章写得很好,它是这样讲的,“有时候认识中美关系,关键不在于最新的知识,而在于历史积累的智慧”,我认为这句话对于我们很深的启发。美国是基于欧洲的,有三百年的建国历史,中国和美国都有全局观和世界观。我研究国际关系已经 35 年,我觉得能够和中国谈谈世界观的,就只有一个半国家,一个国家是美国,半个国家是前苏联,俄罗斯还有点够不上,就是欧盟也够不上。所以中国人的思考很宏大。潘忠岐教授讲的是对的,美国人的思维是比较具体的,但是毛泽东和尼克松可以谈起来,可见中美两国有对话的基础。

第二,是建设新常态下的新的哲学理念。当前这一个阶段,尼克松所谓的“世界五大中心力量”还在演变。近代世界 500 年来,我们碰上的就是转折点。为什么基辛格多次引用中国围棋中体现的哲学思想?我一直说世界还活着的,只有三个半战略家,一个是基辛格,一个是布热津斯基,还有一个是赫尔姆特·施密特(德国前总理),还有半个是李光耀。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一,担当过重任,二,热爱他们的祖国和他们的制度,三,都是九十岁以上,我认为九十岁以上很重要。基辛格在其新书《世界秩序》中,开头便写到他去见杜鲁门。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杜鲁门在谈话结束时说的话,“年轻的时候以为什么事情都能办成,到年纪大了才知道,办不成什么事情”。这跟中国是有关系的,我们处在转变的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全球性的

问题,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有新的哲学理念。

第三,充分利用特定时段或者特定问题上的务实哲学,即实用主义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同斯大林合作,罗斯福讲的很清楚,斯大林是个小魔鬼,希特勒是个大魔鬼。尼克松同中国合作也是要对付苏联,毛泽东也讲得清楚,“打倒美帝国主义”这个口号是空的。在后冷战时期,双方的特定哲学就是利益,在比较多的情况下是经济利益,当然不完全是经济利益。现在这个新时期我也讲不清楚是什么时代,恐怕是双边问题和全球问题的叠加期。

在这个叠加期中,用基辛格的话来讲,中国和美国面临着全世界的问题,很多问题需要合作才能解决,把重大问题先搁一下。美国和中国合作,为的是将来改变和塑造中国。中国与美国合作,目的可能是在将来超过美国。但在习近平执政十年,到底将会是什么样的,还观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吴心伯:我简单回应两个问题,一个是伊朗问题,伊朗问题比古巴问题复杂一些,一是核问题,核问题上达不成协议,奥巴马再怎么想缓和美伊关系都不可能。二,美国国内有以色列和美国国内犹太利益集团的压力,当然古巴利益集团也有,比如古巴流亡者就强烈反对改善美古关系,但相对来讲他们的影响力很有限,犹太利益集团发挥影响力的能力低很多。奥巴马现在是真心想解决伊朗问题,但能不能做到,是成事在天。

第二个是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问题。按照惯例,《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四年一次,上一份是 2010 年 5 月出来的,那第二份应该是 2014 年 5 月出来,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我估计,跟乌克兰和伊斯兰有关系,这两个问题搞的奥巴马政府措手不及,需要把这些问题都反映进去。我估计是

年底和年终会出来,我认为,这个报告的基本要点已经有了,包括奥巴马已经在西点军校的演讲,前任国防部长哈格尔 2013 年 9 月在 CSIS 的演讲,还有奥巴马的军事态势报告,所以应该没有太多新的东西。

宋国友: 为什么在美国长时间生活的中国人和我们中国的学者看美国的结论不太一样。如果你仅仅是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世界同样如此,但如果是中国人站在中国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看美国,感觉是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一个不断上升不断发展的国家里面去看美国,这种视角显然会发生很大变化,这不仅仅反映了中美两个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变化。在美国长时间生活的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没错,中国学者的看法也没错,跟自信也没有关系,反映的是一种现实。

第二,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不能只看数据,2014 年双汇购买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集团的投资大概是 70 亿美元。但是中国的报道,包括《第一财经》和《21 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显示,后续的 40 多亿美元来自中国银团的贷款。中国的国有银行看好这个项目,给双汇贷款,以双汇的名义去并购史密斯菲尔德,最后的钱还是国有银行的钱。

第三,回应一下吴老师说到的北京专家的观点。这样的观点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以前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就是世界的运行,很少受到外生性因素的影响。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出现了一个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几乎和美国相当的中国。这样,美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成长的外生性因素就在不断的扩展,不能只按照美国经济内生的运行周期去看美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也就是说,必须把中国的因素和其他的世界经济发展因素纳入到对美国经济的判断上来。毕境外生因素,比如中国因素,其实是不能够判断的,所以不能

够按照美国以往的经济周期来判断未来美国的经济走向。

吴心伯： 中国和美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2014 年中国是 30% 左右，美国是 23% 左右。所以，2014 年中国超过了美国，但如果美国 2015 年能实现 3% 的经济增长，那么美国有可能会重新回到第一的位置，也就是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但这个第一跟以往不一样，因为跟中国这个第二的差距比较小。